

柴。农村做饭烧的是草柴、包谷秆、树根等，冬天土炕取暖也要用柴烧。柴要到对面的山里去砍，分成两捆，每次80斤、100斤，走上好几里地再慢慢挑回来。

饥饿是难熬的，营养不良让他的身材没有长开。在接受我和诸多媒体采访时，贾平凹曾经反复提及，

“我恨故乡，故乡的贫困，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，红苕吃坏了我的胃”。等到后来，弟弟、妹妹长身体的时候，家里经济状况好一些了，所以弟弟和妹妹的个子都比贾平凹要高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贾平凹结束了学习，回到村子里当了农民。“我不是个好农民，因为个子瘦小，没有力气，干不了农活。我初中毕业后，在农村种了五年地。种地全是体力活，犁地、挖地，扬场，修水利渠沟，搬石头，背沙子，都是苦活。我干一天农活，男人十分工，妇女八分工，我只能拿三分工。一个工分是两毛钱，一个大人劳动一天，可以挣到两毛钱，我只能挣到六分钱，后来慢慢才给你涨到四分、六分。当时一个正常的妇女，劳动一天可以挣八分工。老农们全不喜爱我作他们帮手，大声叱骂，作贱。队长分配我到妇女组里去干农活，让那些气量小是非多，庸俗不堪诸多缺点集于一身的婆娘们来管制我，用唾沫星子淹我。”

那段日子很难熬。

而命运又给了他无情的一棒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在隔壁县城中学任教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，开除公职押送回老家劳动改造。在那个讲究政治成分和出身的年代，扣在贾平

我不是
个好农民，
因为个子瘦
小，没有力
气，干不了
农活。

凹全家人头上的那顶“大帽子”，导致他们在全村里受尽了欺负。

不过，在铁板一块的壁垒里，贾平凹硬是靠着坚韧和执着，给自己寻找了一个机会，找到了人生的出路。

那时候，搞农业学大寨，兴修水利工程，当地修建丹凤苗岭水库，建设一个大坝，当地青壮劳力，都去了水库干活，用劳动挣工分。

“后来我听从水库工地回来的人讲，工地上需要一个搞宣传的，写字的，因为我当时字写得好，说你可以去。别人推荐我，但人家也没有啥下文，我听了这话以后，就主动去了。那天生产队长还不允许我去。”

贾平凹不愿意留在村子里，和妇女一块儿劳动，他从家里拿了一些干粮，跑到水库主动干了三天的活。

“我没啥力气，工地的活儿特别累，挖泥挑沙搬石头，搅拌混凝土浇大坝，费体力，特别苦，要从平地扛石头，搬到大坝上。每天要扛够多少立方，才能挣到工分。一天干活下来，浑身累得像散了架，胳膊和腿酸痛，都感觉不是自己的了，一躺下就睡得昏天黑地。”

后来，他在工地指挥部，给领导毛遂自荐，自己会写毛笔字，可以在工地上刷标语。指挥部的领导同意了，他开始在崖壁的大石头上，手拎油漆桶，写上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下定决心、不怕牺牲”等红色的宣传标语。

活干得出色，指挥部的领导觉得贾平凹能吃苦耐劳，老实听话，勤快，字写得不错，就让他到工地上办油印宣传劳动简报。在工地上终于能够吃饱饭了。贾平凹干活很

卖力，一个人负责采访写稿，编辑刻写、油印发行，再通过广播喇叭念自己写的新闻稿。

“当时陕西省只有一份报纸《陕西日报》，我就模仿人家那口气来写，当时版面还要特别活跃，你不能老刻一样的字，比如仿宋体，或者是隶体，这些都是当时学的，而且标题要变化的，还要为了丰富版面学画画。我干这工作干得特别认真，那时天都黑了，我还趴在门外刻蜡版，连夜印，所以好多人就说，这小孩干活特别踏实，对我印象特别好。”

照着省里的日报学习，他也办了一版副刊。自己绘画、插图，又开始学着写诗歌。白天他认真工作，晚上就在工地宿舍里不停地写作，诗歌、散文，什么都写，慢慢积攒了很多，写满了笔记本。

领导觉得贾平凹做事踏实认真，也有一定的文化和才华。

1972年，大学复活准备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。当时，上大学不用考试，完全看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，按照比例下放录取名额，由大队书记确定人选，公社复审、县里最后确定通过。

贾平凹通过爱情抓住了这个机会。他在水库工地上和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女孩好上了。女孩是公社干部的女儿。后来，他们一起被公社推荐到了丹凤县招生办公室。但当时分配给他们公社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名额，而且还是“火箭专业”。贾平凹闻讯傻了眼：“当时我压力特别大，因为我是初中二年级毕业的，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，后面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现在造火箭，这咋办？”